

青海民族学院学术系列丛书之十四

河湟蒙古人

李克郁 李美玲 著

LI KE YU

LI MEI LING ZHU

青海人民出版社

QING HAI REN MIN

CHU BAN SHE

青海民族学院院长基金资助项目

民族研究所重点学科建设文库

河湟蒙古人

李克郁 李美玲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河湟蒙古尔人 / 李克郁, 李美玲著. —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5. 1

ISBN 7-225-02671-2

I. 河… II. ①李…②李… III. 土族—民族历史—研究—青海省 IV. K283.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0266 号

河 湟 蒙 古 尔 人

李克郁 李美玲 著

出 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发 行 : 邮政编码 810001 总编室 (0971) 6143426

发行部 (0971) 6143516 6123221

印 刷: 青海西宁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6.125

字 数: 360 千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书 号: ISBN 7-225-02671-2/K·174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李克郁 土族，教授，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专家，青海省政协第五、第六届委员，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理事。曾在中科院民族语言研究所工作，参加了50年代国内蒙古语族语言调查队、全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及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队。后调入青海民族学院从事教学科研，设计了土文方案，著有《土汉词典》、《土族（蒙古尔）源流考》、《土族婚丧文化》、《土族格赛尔》（译著）等多部专著，参编《蒙古语族语言词典》、《甘青特有民族文化形态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等多部著作，发表有关土族历史、语言方面的论文50余篇。获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项，国家四部委表彰一项。

河湟

蒙古尔人

李美玲 土族，现为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语言文化，发表了《土族语长元音的形成》、《土族语词首清擦音f的演变》、《〈蒙古秘史〉语与土族语语音比较》等论文20余篇，出版合著《土族婚丧文化》一部，参编《甘青特有民族文化形态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饮食文化》、《神秘的热贡文化》等多部著作，获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项。



達達原草方

中紀世 10-9

期時前以及原草一統

初紀世 13-10

（初紀世 13）

（東紀世 14-1）

莫 達
戈 幹
勒 尔
族 族

- 责任编辑 李永华
- 封面设计 王小剑



前 言

一位学者曾经说过：“土族没有文字，所以没有历史。”另一位学者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也说过：“没有文字的民族是痛苦的，不懂得自己历史的民族算不上先进民族。”以上两种说法的对与错，恐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需多加评说。不过问题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一个民族有文字总比没有文字好，懂得自己的历史总比胡乱攀附好。问题同样是很清楚的，从没有文字到有文字，一个民族从不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到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不可能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而要经过许多人的长期艰苦努力才有可能。

清康熙年间，梁份巡视甘肃边界后撰写了《秦边纪略》。此作成书年代是1691年。梁份在谈到甘肃土人的来源时说：“土人或云：其先世夷人，居中土已久，服食男女与中国无别，且久与汉人连姻，与汉人



言，则操汉人音，又能通羌夷语，其实心为汉，非羌夷所可及云。西宁、庄浪者亦然。”从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关于甘肃土人的来源，梁份问过土人，土人自称源自夷人。夷者蒙古也，在此专指元代的蒙古。这部分蒙古自归附朱明以后，实心为中央朝廷效力，土人各土司抛头颅洒热血，为国家的统一，边疆的安定，各民族的团结友谊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因此得到了“实心为汉”的赞语。至于所说“非羌夷所可及云”中的“夷”同样是指蒙古人，但不是指元代的蒙古，而是指套夷或海夷，亦即指元亡一个半世纪后进入甘肃的蒙古人。梁份如此区分先来后到的两部分蒙古人是有道理的。

梁份巡游甘肃边界后感叹道：“朱邪赤心尽忠于唐，后裔之昌宜哉！”“而西宁之共支大厦者，非李祁土司而谁也！”明确告诉我们，土人的李土司是唐仆射李克用之后裔，因为朱邪赤心是李克用的父亲，在唐因功而赐姓名为李国昌。蒙古化的沙陀后裔在元镇守西宁，至明演变为东西二李土司。东西二祁土司皆为元室勋裔，其直系后裔及部众亦人众势盛，故李祁土司当时在西部边陲政治、军事舞台上成为朝廷依靠的力量，号西部劲旅。

1844年，法国人古伯察（Regis Evariste Hus，1813~1860年）和秦神甫（Joseph Gabet，1808~1853年）从内蒙古的翁牛特旗出发西行去西藏，他们的向



导是桑达钦巴 (Samdadchiemba)。桑达钦巴向二位神甫自我介绍说, 他自己是察罕霍尔 (即白霍尔、白达勒达、察罕蒙古尔) 人, 出生在甘肃碾伯县的三川, 属于察罕霍尔吉土司后面的人。二位神甫从桑达钦巴那里听了很多有关察罕霍尔的故事, 经西宁去佛教圣地塔尔寺的途中, 他们又遇见了察罕霍尔的上层人士和普通百姓, 调查访问了有关他们的一些情况。古伯察在谈到察罕霍尔的族属时说: “如果相信他们之所说, 那么他们就属于鞑靼 (达勒达) 血统。”此说不是古伯察推论、猜测之说, 而是察罕霍尔人们都这么说的。

19 世纪下半叶, 俄国旅行家 H·M 普热瓦爾斯基在他的报道中称甘肃土人为达勒达人, 并说达勒达人较接近于蒙古人。其后俄国人 R·H 波塔宁称甘肃土人为西荣郭勒蒙古人, 或安多定居的蒙古人。并且说, 他们自称为察罕蒙古 (白蒙古), 而汉人把他们叫做土人, 蒙古人称他们为达勒达。比利时传教士蒙古语言学家田清波 (A·Mostaert) 和德·斯迈德 (A·desmedt) 曾来往于蒙古的鄂尔多斯和土人的纳仁郭勒之间, 他们称土人为蒙古人, 称土人的语言为“西部甘肃蒙古人所说之蒙古尔方言”。二位神甫是第一个全面系统研究土人语言的学者。比利时人许让神甫于 20 世纪初来到了土人聚居的纳仁郭勒 (今互助土族自治县东山乡), 他在土人中生活了十几年, 广泛深入地



调查了土人社会，并与土人的上层一起处理了几件土人中发生的民事案件。他在《甘肃土人的婚姻》一书中谈及土人来源时说：我们所说的土人除蒙古化的沙陀人外，无疑是正統的蒙古人，是蒙古化沙陀人和蒙古人的混合体。

外国旅行家和传教士研究甘肃土人，不管出自何种动机，他们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依然令人钦佩。他们长期地生活在土人地区，进行了精心的观察，忠实地记录了土人中间流行的传说和他们社会中的各种现象，并作了非常客观的描述，从而给我们留下了一幅活生生的土人社会。他们对土人历史来源的论述完全建立在既丰富又扎实的材料的基础之上，几乎找不到一处猜测推论的言辞，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科学精神啊！

20 世纪上半叶，旧政府的某些官员和社会显达对甘肃土人偶有报道，也仅仅停留在纯属报道的水平上，谈不上有任何民族学意义上的研究。有关土人的历史，他们也只是围绕“土”字说了些推论和猜测的话，如土人的“土”与吐谷浑的“吐”相提并论就是一例。其实，土人的“土”不单与吐谷浑的“吐”相谐，而且与突厥的“突”、吐蕃的“吐”相谐，更是与土耳其的“土”、土库曼的“土”同音同字，何以知之土人的“土”就是吐谷浑的“吐”而非其他“吐”或“土”？何以知之土人为吐谷浑后裔而非突



厥、吐蕃、土耳其、土库曼后裔？猜测、推论、遐想不能当作科学，因此，土与吐相谐，土人即吐谷浑后裔的论调只不过是土族史研究过程中的一个插曲罢了，既没有历史证据，也没有现实证据。

笔者（李克郁）很幸运，1955年参加了国内蒙古语族语言调查队，1956年又参加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先后两次赴互助、民和、大通、同仁等土族聚居地区调查了土族语言。其后在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专事土族语言的研究工作，又多次赴青海调查了土族语言。大家都知道，要想了解一个民族的语言离不开该民族的历史。鉴此，调查队对土族的历史来源也作了必要的调查访问，还召开过专门的座谈会。

随着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为进一步解决好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1958年，国家组织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队，对国内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及其历史进行了空前规模的调查。在中央民族学院（即今中央民族大学）陈永龄教授的带领下，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人员、中央民族学院史学教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和应届毕业生共同组成的土族社会历史调查队赴青海调查土族。青海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也派员参加了调查队。笔者（李克郁）受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委派为调查队成员之一。汪公量先生在北京翻阅史籍、档案，搜



集有关土族的记载。这次对土族社会历史的调查，无论是人员的组成方面，还是调查范围的广泛、手段的先进以及研究的深入方面都称得上是史无前例的。调查队的直接成果就是编写出版了《土族简史简志合编》一书。

《土族简史简志合编》是调查队根据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乐都县和甘肃天祝县等土族聚居区的实地调查材料以及在北京、西宁、兰州和青海省其他各县收集到的文献资料，综合编写而成，所用资料的客观、丰富、扎实，也是前所未有的。中共互助县委对第一稿进行了审查和讨论，青海省委统战部主持的科学讨论会、中共青海省委组织的三种民族问题丛书审查委员会、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曾先后对几次的修订稿进行了反复的审查和讨论。1960~1961年，笔者（李克郁）和戴可来受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委派，带着《土族简史简志合编》和《撒拉族简史简志合编》书稿再次赴青海，征求了有关党政领导同志的意见，并对讨论中提出的一些问题重又进行了调查和核实。因此，在关于土族的来源与形成问题上，《土族简史简志合编》得出“蒙古人在土族来源的诸因素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和“土族是一部分蒙古人与当地霍尔人长期相处逐渐发展而成的说法比较可信”的结论是正确的。由此土族史的研究又走上了科学的道路。不



过，当时因资料的限制而尚未弄清“霍尔”的真正含义，“至于土族传说中的霍尔人，究竟是指哪一个古代民族，现在很难断定，是一个有待很好研究的问题。”经过层层把关，反复推敲过的《土族简史简志合编》的科学性也在于此，它不仅看清了土族来源的基本方面，而且将悬案如实地留给了后人，反对任何不切实际的推论和猜想。1981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写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一书也说：“土族早期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这和土族来自游牧的霍尔人和蒙古人有关。”“从明初起，土族地区就被明朝分封的十八家土司统治，他们大都是元朝的州官……。”何谓霍尔人？这个问题现在已经不再是什么问题了，霍尔人就是蒙古人。在16家土人土司（还应当加上甘肃连城鲁土司和年都乎王千总）中，三李土司（东李土司、西李土司、小李土司）、冶土司、喇土司是蒙古化的突厥人，东祁土司、西祁土司、鲁土司、赵土司、阿土司、汪土司、纳土司、吉土司、甘土司、朱土司、辛土司及王千总都是蒙古人，独有陈土司是汉人（陈土司既然是土人的土司，则有可能是蒙古化了的汉人）。土司是霍尔人的部落首领、民族代表，那么霍尔人的代表、部落首领当然是霍尔人。可见《中国少数民族》关于土族来源的论述也无疑是正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即1980年，青海省组建了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土族简史》编写组。



众所周知，自 1958 年的社会历史调查和编写出版《土族简史简志合编》以后，由于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土族史的研究完全停顿了下来，研究的水平当然也就停留在 50 年代的水平上。按理《土族简史》的编写应以《土族简史简志合编》和《中国少数民族》两本书的观点为准才对，这无疑是科学的，符合情理的选择。然而在几次学术讨论会上，有人完全从自己的主观推测和想象出发，一味坚持土族为吐谷浑后裔，把《土族简史简志合编》和《中国少数民族》两本书中的正确结论搁置一旁不顾，如同无此一说，只字不提。于是，坚持《土族简史简志合编》的同志和持吐谷浑说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两种意见相持不下的情况下，考虑到《土族简史》如期出版，双方都作了必要的妥协，定稿时在土族族源问题上采取几种观点分别叙述，编写组倾向于吐谷浑说，并以“按语”形式向读者加以说明。编写组的按语写道：“关于土族历史来源的种种问题，尚待今后深入研究。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我们认为，土族源于吐谷浑之说，道理更多一些，比较可信。”问题再清楚不过了，编写组采纳吐谷浑说并不意味着土族就是吐谷浑后裔，土族的族源问题仍然是“尚待今后深入研究的问题”，研究的结果也有可能土族与吐谷浑无关。我们早就认识到采纳吐谷浑说是一种误导，《土族简史》出版后这些年的实践无可争



辩地证实了这一点。

族源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对民族的团结、发展和进步极为不利。为使土族史的研究走上正道，坚持《土族简史简志合编》的同志作了不懈的努力，1993年出版了《土族（蒙古尔）源流考》，在公开的刊物上发表了《蒙古尔（土族）是历史上不同时期来到河湟流域的蒙古人》、《白鞑靼与察罕蒙古尔》、《霍尔杂谈》、《dolda（达勒达）辨析》、《拨开蒙在土族来源问题上的迷雾》、《土族赵土司族系考》、《土族李土司家族史》、《土族族称辨析》、《土族姓氏初探》、《宁濮郡王驸马长吉族属考》、《格勒特即西平王奥鲁赤考》等多篇有关土族历史来源的文章，为的是希望引起学术界和土族同胞的关注，并在双百政策的指导下，求真务实，展开有益的讨论。

我们注意到，1980年以后，就土族历史来源问题有不少学者发表了文章，都认为土族来源于蒙古，如民族出版社出版了高阳伯后裔李永瑜先生的《沙陀李晋王及其后裔》，对西碾李土司的族属作了系统的阐述，强调三李土司与吐谷浑无关；藏族学者仁钦扎西发表了《西平王府今地考》，认定西平王府的今地在互助土族自治县的松多乡，表达了土族与蒙古的密切关系；崔永红等编著的《青海通史》认为土族与蒙古密不可分，土族可能是从阔端属部发展而来；持土族



为吐谷浑后裔的半一之在《青海蒙古族历史简编》中也承认东、西二祁土司是蒙古人；胡国兴主编的《甘肃民族源流》更是承认西碾庄浪的东祁、西祁、阿氏、赵氏、鲁氏五土司为蒙古人；我省史学家赵盛世先生为《沙陀李晋王及其后裔》一书作序，毫不犹豫地肯定西碾三李土司为沙陀突厥后裔，本姓朱耶（邪）；李文实先生在《读〈沙陀李晋王及其后裔〉》一文中也承认李土司出自沙陀，他写道：“沙陀即是突厥的别支，入中原后先后建立五代的后唐、后晋、后汉三朝，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经历分立王朝的时间虽短促，但其始终以扶唐见称，其子孙在明清又特有功伐，衍为近世青海东伯府、西伯府二土司，代有勋绩，如李南哥、李英、李文等，在西北历史上，均著有声名，对安定地方，居有一定作用。”李文实先生还拿出清人严遂成的《三垂冈》一诗赞李克用父子。诗曰：

英雄立马起沙陀，岂奈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李文实先生原先持土族为吐谷浑后裔的观点，也发表过文章，到了1996年，他不再坚持了，至少他



承认土人的三李土司是沙陀人，与吐谷浑无关。至于其他土司他怎么看，我们就不好说了。总之，经过 20 多年的努力，土族史研究中的诸多悬案有了初步的答案，土族的来源及形成逐渐在我们面前明朗了起来。原来明清时的甘肃土人都是元朝驻守甘肃行省的蒙古军队及随军部众，他们归明后，被安置于西宁、碾伯、庄浪、河州、凉州、保安等地。他们当中既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也有信仰藏传佛教的，既有正统的蒙古人，也有蒙古化的突厥人。信仰伊斯兰教的土人形成了两个民族：一是以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和蒙古化的撒尔塔人为主吸收了其他民族成分，自称撒尔塔的东乡族；二是以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和色目人为主吸收了其他民族成分，自称保安的保安族。信仰藏传佛教的土人也形成了两个民族：一是以蒙古人和蒙古化的沙陀突厥人为主吸收了其他民族成分，自称蒙古尔、察罕蒙古尔的土族；二是以古回纥和蒙古人为主吸收了其他民族成分，自称尧乎尔的裕固族。甘肃土人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 4 个独立的新型民族，而土族只是甘肃土人中的一部分，并且是少部分。甘肃土人的大部分除演变为 4 个独立民族外，还有一部分土人融入到汉族和其他民族中去了。

出版发行《土族简史》到现在足有 22 年了，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照理当时编写组争论的一些重大问题应该有一个符合实际的结论，然而事与愿违，问



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出现了一些更为现实的问题。于是，过去旧有的争论在继续着，新的争论，即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又提到议事日程上了。我们编著此作，重申研究之状况，并以示编就一部基本符合土族社会历史的土族史，还要靠各家学者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

著者

2004年5月